

空间共享

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

武廷海 张能 徐斌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078214)资助

国家“985 工程”三期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资助

空间共享

——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

武廷海 张能 徐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武廷海,张能,徐斌
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398-5

I. ①空… II. ①武…②张…③徐… III. ①城市化—发展—
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3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空间共享

——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

武廷海 张能 徐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398-5

2014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 35.00 元

序

近日得武廷海等同志所著《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一书，薄薄一册，读罢颇有感触。作者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的重要标志，1990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动产的动产化”所推动的“资本城镇化”过程，而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总方向应当是“使用”优于“交换”，以满足人们的空间需求为目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当前城镇化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解释，带给我们不少启发，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大规模新城建设的甚嚣尘上、超高层建筑的层出不穷，等等，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找到一定的剖析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但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欠账和问题，不得不面临着转型。从1970年代末起，我国开始逐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当时虽然是借鉴西方的制度，但是研究的并不十分透彻，并未意识到可能带来的若干问题。我记得在此项制度探讨之际，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就曾经对我说：“你们要小心，这是决定是否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的话，这个魔鬼就没法再装回去了”（大意）。现在回头

来看,他说的话果然应验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关注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发展占用农田等现象,当时,北京城市人口比解放初多 1.7 倍,占地扩大了将近 3 倍;南京自解放以来,建成区用地由 38 平方公里增加到 104 平方公里,扩大将近 2 倍;武汉建成区由 33.5 平方公里扩至 153 平方公里,扩大 3.7 倍;广州建成区自 36 平方公里扩至 143 平方公里,增加了 3 倍。针对这一现象,1978 年,我在《城市规划》杂志第 5 期发表题为《纵得价钱,何处置地?》的文章,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节约用地的问题,认为“土地和空间是国家的资源”,要格外珍惜使用。当时尚未全面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文章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土地投机”,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说“用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财政资本的一种特别有利的业务”,这一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造成其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之一。今天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当时城市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和今天动辄成百上千平方公里的新区相比较,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当时意识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投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浮现出来了。

第一,房地产的畸形繁荣。从中国当前的住房发展来看,主要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建设经营模式,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虽推进了住房建设,同时也存在很大缺陷,房价暴涨不下,广大中低收入社会群体住房短缺。美国学者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在 1934 年出版的《近代住宅》一书中即指责当时住宅经营为奢侈的投机(the luxury of speculation),指出“不好的制度不能

产生好的住房,但只有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能产生好的住房”。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可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不能盲目遵循美国房地产的发展途径。在城镇化进程中,住房,特别是社会住房,并不单纯是一个盖房子的问题,而是与城市的全面、整体和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安居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应当为房地产的发展逐步地注入社会主义的内涵,从“金钱经济”(money economy)转向“民生经济”(life economy),将人民群众的空间需要作为一切空间规划、建设、生产和分配的出发点和归宿(1966年,美国人文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是“金钱经济”,而不是“民生经济”)。

第二,超高层建筑的层出不穷。在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后期,城市人口密集,大型企业又都争先恐后地在最繁华的市中心争取立足之地,以提高商业地位,由于地价急遽上涨,建房者又希望在昂贵的地皮上能够建造尽可能多的建筑物,于是超高层建筑相继兴起,纽约的华尔街、时代广场等地区,处处都是高入云霄的摩天楼,就是在这种时代和背景下的产物。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幕景象也正在热热闹闹地上演着,有报告称: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5年之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是现在美国总数的4倍,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的“资本化”的过程,不仅存在着基础设施、安全、生态、运营成本等技术性的问题,其背后还隐藏着社会、经济上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大规模新城建设的甚嚣尘上。自2008年开始,“国家战

略性”区域规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截至目前,已经覆盖了接近40%的国土面积,几乎每一个省区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随之而来的则是遍布全国的各类型的规模空前的新城、新区规划。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一次性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虽然满足了一时的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长久的危害,威胁粮食安全、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为今之计,宜乎转变这种发展模式,讲究发展质量而限制发展规模,结合地方发展状况和自然条件,进行逐步的、小规模的开发利用。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即发展了周边一系列的小城镇,包括北碚、江北、南岸、青木关、“山洞”发展区等等,通过交通联系,形成总的组合,并将自然山水、田地作为天然图画의 “图底”(figure-ground),也同样能够胜任一个大城市的功能需求。现在,科技进一步发展,穿山、搭桥等都成为可能,也为城市有机分散式的发展形态带来新的创造可能。

为什么出现上述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怀有强烈的“土地财政”动机。当前许多城市新领导上任都要修改城市规划,以提高城市定位、扩大城市规模、增扩城市用地规模、设立各种名目的新区,实际上都服从于“土地财政”,即通过招商引资,扩大投资,促进新城新区开发,带动土地升值,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维持城市建设的资本循环。这实际上是一套“空间生产”的做法,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和价值增值(在前述《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一书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阐释)。

第二,与空间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被部门化”。行政部门在制定空间政策、法规和规划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而弱化相应的责任,甚至偏离国家整体的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现在讨论空间规划的范围越来越大,国土规划、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混为一谈。

第三,城乡建设中长期存在“重城轻乡”的思想。为了发展城市而不惜牺牲农村,为了土地开发进行简单粗暴的征地。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乡村发展形成了不可容忍的忽视,“三农问题”日益严峻。

第四,对城镇化问题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长期以来,将复杂的城乡建设与城镇化当作简单的经济现象或物质建设工作。用一个简单的目标来概括复杂的城镇化进程,或聚焦于某个问题,或聚焦于某一方面,复杂问题被简单化,造成顾此失彼,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被动局面。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讨论越来越热烈,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如何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制定相应政策,在顶层设计方面,需要预为思考,建议在下列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第一,充分认识城镇化的复杂性,采取“复杂问题有限求解”的方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化错综复杂问题为有限关键问题,寻找在相关系统的有限层次中求解的途径。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五大系统还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稳定的状态,那么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如今,上述五个系统则已经出现了比重失衡且各自为政的局面,亟需重视系统之间的交叉联系,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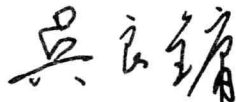
第二,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别化的发展策略。对于特大城市地区,促进生产要素的灵活流动和重组,在区域尺度上对特大城市过分集中的功能进行有机疏解,同时提高中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吸纳与服务功能,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大中城市均衡分布、有序流动,形成一种城乡协调的“城乡统一体”;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有序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依据各地各具特色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文化特色等现实情况,积极进行城镇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创新试点。

第三,加强城镇化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提高城乡规划的决策水平和技术支持。城镇化是一项复杂性、专业性、连续性都很强的工作,有关的决策需要在了解历史和熟悉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与问题,不能照搬别人的成绩,照猫画虎。目前,中国城市建设的重大决策都集中在市委书记和市长,今后当然也会如此,但是领导多从非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且调动频繁,客观上存在任意建设、政绩工程乃至瞎指挥等现象。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继续坚持与进一步加强市长、书记培训工作外,迫切需要在市委市政府决策层中增加技术性参谋,较为长期地在宏观上参与、把握城市的发展命脉,为城市政府决策提供建筑、规划和工程等方面的专业咨询,加强决策的科学性、继承性,建议在少数城市工作中进行试行城市总建筑师、城市总规划师、城市总工程师制度(“三总”制度),对城乡发展进行整体的研究、决策和管理。

第四,发展人居环境科学,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关系国计民生,人居建设的目的是创造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满足人的需求,包括空间需求,人居建设应该成为五大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要积极发展人居环境科学,为解决当前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发展目标的思想理念、组织研究的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的技术工具和战略措施。

城镇化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科学解决离不开全面深入的理论思考。十多年前武廷海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勤学善思,对城市规划与城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每每有独到的理论见解,作为研究所集体成员之一,参与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原本学地理出身,后从事城乡规划研究,能运用地理学基础发挥很好的作用,且不同于地理学,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已经成为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之一,最近带领研究生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将中国城镇化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进行深刻的理论剖析,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深度触及了近年来我关注的一些问题,勇气可嘉,成绩可喜可贺。上述内容也是我有感而发,爰以为序!



2013年9月9日

目 录

序

引言 城镇化作为空间实践.....	1
一、中国传统的空间经验	2
二、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6
三、乡村关系与城市关系	9
四、空间与资本	12
五、新型城乡关系与新型城镇化道路	16
六、在城镇化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17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理论	21
一、世界城镇化进程概况	22
二、资本积累与过度积累危机	26
三、空间生产与不动产的动产化	30
四、国家干预与集体消费	35
五、资本城镇化与三次资本循环	39
第二章 乡土中国的市镇发展	45
一、基于农耕文明的乡村与城市	46
二、近代通商口岸城市	47
三、乡土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49

四、革命战争时期的城乡关系	51
第三章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消灭城乡差别	55
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56
二、非城镇化的工业化	59
三、农村人民公社实验	63
四、控制城乡人口流动	66
第四章 空间商品化与市场化	71
一、小城镇大发展	72
二、土地有偿使用的探索	76
三、土地商品化与住房市场化	79
四、房地产业的勃兴	83
第五章 资本城镇化	89
一、中国新城现象	90
二、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生产	96
三、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资本循环	101
四、资本逻辑与利益博弈	107
五、城镇化危机的涌现	112
第六章 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	117
一、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118
二、明确空间生产的需求导向	122
三、通过空间实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24
第七章 走向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策略	129
一、重建城镇化的资本循环	130
二、探索城乡参与的土地开发模式	132

三、建立城乡空间政策分区	135
四、建立城乡空间税收调节机制	139
五、完善城乡住房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141
六、统筹城乡规划	145
第八章 在城镇化的空间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149
一、从生产关系论新型城乡关系	150
二、从社会主义建设论新型城镇化	152
三、从现代化建设论中国城镇化	153
参考文献	157
后记	173

引言

城镇化作为空间实践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而席卷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流、合作与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城镇化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方式和手段,关系着发展的方向和全局。自觉认识城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中国城镇化的方向以及探索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策略,都是值得深思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于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众说纷纭。本书之所以选择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城镇化研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那种独特的“总体性的眼光”,以及认识问题时的彻底性和说服力。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理论是认识现代条件下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本书即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理论,将城镇化视为一种空间实践,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城镇化的经验与规律,揭示问题与矛盾,进而从空间的角度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空间策略。

一、中国传统的空间经验

在介绍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实践之前,有必要简略认识一下中国传统的空间经验,作为一种讨论的准备,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上的引导。

本书著者是建筑学院而非马列学院的师生,因此著述亦从建筑学人耳熟能详的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入手: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是人们常常引用的有关中国古代“空间”理论的经典文献,说明在中国传统的经验中,“空间”不是任意的、抽象的空间,而是由人通过他的器物所指明的空间,例如老子所说的一车、一器、一室,空间是通过人类活动创造的“人化”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中标点为著者新加,将“无”与“有”之间标为顿号,表示并列关系,即器物的空间由实体的“有”与虚体的“无”共同构成,“有”、“无”相互发生、相互依存,没有“无”这个“用”,就没有“有”这个“利”,反之亦然。而在以往的标点断句中,一般将“无”后面标为逗号,“有”作为一个副词,从而突出器物所具有的“虚空”的作用。^①

^① 通常标点断句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空间”概念具有层次性,小至一车、一器、一室,大至一村、一城、一国乃至天下。在不同层次的人居空间安排与社会治理方面,中国人表现出非常实用的智慧。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条件还很低,但是从文中提到的聚落的规模、交往的频率、人民的数量、交通联系的方式、人民与土地的情感等来看,人类空间实践活动的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已经有所涉及,其中“安其居,乐其俗”更是成为古代中国追求的“乐土”的一个空间特征。

《管子》记载了古代进行城市与区域空间建设时,在城野、居民、衣食等方面相当可靠的经验以及定量数据。城市与区域空间包括由城墙、住房、水源、防卫设施等组成的物质环境,也包括城市中的人民,以及养育人民的物质之源——土地。政治家们将全体民众按照土地所能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方式的特点加以组织,指派于特定的区域,从而将社会的组织结构或社会秩序进行“空间化”。古人关于社会空间诸多关系的安排、协调和处理,已经置于“政之本”的高度。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防涝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

制国以为二十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

在大一统的帝国时期，中国古人更是保持着对“天下”这一空间秩序的敏感性，追求一种“自然的”空间秩序，对于可能导致空间变迁的结构性力量有着成熟的认识。例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在叙述全国各主要经济区域的地理特点以及城市发展基础时，指出人口具有社会分工，货物受“价格机制”调节在空间上“流动”，“各劝其业，乐其事”，这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地图和秩序变迁的自然之“道”：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还总结，社会行为具有趋“利”的特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经由“市场”的引导，形成城市、区域乃